

美国民粹主义新动向及其影响

沈雅梅

【内容提要】当前美国民粹主义强势抬头，左右翼民粹力量同时发力，渗透主流政治，冲击美国内政外交诸多传统，民粹主义开启的政治权力再分配尚未完成。美国民粹主义有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包括经济不平等加剧、人口结构变化不利于白人传统优势地位、中下层白人和精英之间的政治裂痕加深、社会“弱势群体”对奥巴马执政的反弹等。美国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反华”，但它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同步升温值得警惕。民粹主义与“反华”舆论有相通的经济和文化根源、相近的思想逻辑，且都有被精英政治利用的一面，我们需要警惕和预防两者的合流。

【关键词】美国政治 中美关系 民粹主义 中国威胁论 特朗普现象

【作者简介】沈雅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6-0001-15

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升温，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新的风险。同时，美国精英和媒体炮制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外部环境挑战增多。目前看，民粹主义与新“中国威胁论”有相通的经济和文化根源，都是全球化负面作用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的产物，体现了美国部分社会群体通过诉诸“阴谋论”，“妖魔化”其他群体操控政治议程的努力。不同的是，民粹主义源起于“草根阶层”，通过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执政，上升到国家政权最高层面，进而向国家议程渗透。“中国威胁论”则体现了精英层面反华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尖锐化。这两个方向上的运动或思潮尚未合流，但我们需警惕和防范美国民粹主义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可能性。

一、美国民粹主义新动向

从概念看，民粹主义有三个核心要素，一是崇拜“人民”，二是反对“精英”，三是主张政治应该是“人民公意”的表达。^[1]从实践看，它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通过魅力型领导、社会运动或政党重组等多种方式进行政治动员，激发特定的民众基础；二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提出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方案；三是反对原有的精英和制度，寻求联合社会中上层力量，建立新的规范和制度。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民粹主义既是政治挑战者的工具，也是精英用来贬低草根政治的标签。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并推升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被决策者、两党及各种社会运动频繁使用，成为“社会中的某个群体将社会矛盾的责任推卸给另一个群体”的工具，其发展呈现出以下动向。

（一）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崛起

历史上，左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居于弱势，右翼民粹主义相对活跃。

[1]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p. 19-20.

左翼民粹主义把特定的经济阶层（工人）视为“人民”，反对贫富差距和资本主义，敌视富者，捍卫特定阶级的利益，支持全民福利和国有化，例如 19 世纪 90 年代的人民党、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及 2016 年大选中的“桑德斯现象”。右翼民粹主义把特定的种族群体（白人）视为“人民”，排除外来移民，极端强调本族利益，拥护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奉行经济民族主义，鄙弃多边主义，例如 19 世纪末的排外运动、20 世纪 30 年代天主教父考福林的反犹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乔治·华莱士的反民权运动、1992 年罗斯·佩罗及 1996 年帕特·布坎南的反自由贸易运动、2010 年以来“茶党”运动及“特朗普现象”。^[1]

当前，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崛起，彼此角力，总体上右翼民粹主义占据上风。两股力量分别以佛蒙特州参议员、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和总统特朗普为依托，在两党内部找到了新的发力平台。民主党内，以克林顿势力和桑德斯力量为分野的泛自由派和泛左派路线之争尚未解决，草根激进派崛起成为新的亮点，吸引了相当多的年轻人。他们关注经济和阶级议题，反对特权，主张平等，同情弱势群体。2018 年中选过程中诞生的多位民主党新生代所谓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正如桑德斯谴责资本主义为“让太少人拥有太多、太多人拥有太少的政治进程”^[2]，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资本主义是国家问题的症结。在共和党内，反建制、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民粹情绪高涨，种族、宗教、民族、文化等议题备受关注，控制政府支出、减少赤字和债务、维护同盟体系等传统的主张变得不受欢迎。面对特朗普上位，共和党建制派持续“出走”，如众议院议长瑞恩宣布弃选、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辞职。而党内高层和选民对特朗普明显更为宽容，“谁更特朗普”

[1] Ragini Ahuja, "The History of Populism: A Review of the Populist Explo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Vol. 70, Iss. 2, Summer 2017, pp. 179-180.

[2] David Catanese, "How Sanders and Warren Will Decide Which One Runs for President," *The Atlantic*, August 28,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8/08/warren-sanders-trump-2020/568462/>.

成了共和党人组织中选的得票优势，“反特朗普”却有葬送共和党人政治生涯的风险。这种政治气氛催生了夏洛茨维尔骚乱事件、针对民主党精英的炸弹邮包、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等暴力事件。

（二）民粹主义力量从边缘上升到国家政权层面

美国主流政客从不忌讳利用民粹主义的力量为自己造势，例如，安德鲁·杰克逊是美国第一位以普通人自诩、也是美国第一位反建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多项政策源于人民党的主张；里根的信条“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吸引了一大批保守的“里根民主党人”，是他胜选的法宝。^[1]可以说，历次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为了争取民意，往往套用民粹主义的话语和策略。但这一轮民粹主义抬头通过特朗普的执政，上升到国家政权最高层面，实现了向政治议程渗透。民粹主义不再只是一种竞选策略，而是国家政策实践，并且是在政府建制及其所代表的一系列合法性原则框架下运行。在联邦政府层面，右翼倾向的官员虽然是少数，但他们的声音更加响亮。在白宫，民粹主义的反建制诉求更是得以加速释放。

特朗普的两大标志性政策立场，一个是强化美国的移民政策，一个是重塑国际贸易秩序，这两点都直接迎合了美国白人劳工阶层的诉求，反映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反移民、反精英、反全球化情绪，对往届政府所执行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发起了进攻。特朗普高呼“使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建起那堵墙”（Build the Wall），把美国社会内部复杂的矛盾与非法移民问题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并且归咎于以往的华盛顿精英，用打破“政治正确”的大胆提案博得了核心选民的支持，其拳击式的公共交流方式、报复性的外交风格，均属于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套路。从团队基础看，以白人种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右翼民粹主义，自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出“夺回美

[1] 付随鑫：《美国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运动及民族主义的复兴》，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5期，第38页。

国”的呼声，把特朗普视为同路，狂热地支持他，并把他作为打击建制派精英的利器，使总统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对白宫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前任首席战略师班农、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等都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者。

（三）民粹主义诉求冲击美国内政外交诸多传统

民粹主义夸大“人民主权”原则，拒绝多元主义理念，突出对“魅力型领导者”的个人崇拜，把一切对其领导者造成约束的因素都视为障碍。与民粹主义的历史表现如出一辙，特朗普抨击媒体，称其为“人民的公敌”；与情报机构交恶，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把“通俄门”调查称为“猎巫”行动；干预司法独立，特赦有种族主义嫌疑的“铁血警长”阿尔帕约；他还对政敌进行人身攻击、轻视知识精英等。一系列言行被主流媒体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颠覆，破坏了选举制度、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全球自由市场等民主原则。^[1]

由于民粹主义追求短期效应，忽视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容易走向非理性。^[2]例如，民主党激进派主张将联邦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数增加到15美元，这比现在的7.25美元高了一倍还多，这个方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极小。特朗普坚持在美墨边境修墙、禁止跨性别人士参军等，这些都是建制派政治家不愿触及的议题，为美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从外交看，特朗普自诩比全球主义精英更了解世界现实，认定美利益与世界利益存在冲突，其他国家不仅与美异心，还嘲笑和利用美的一厢情愿。作为回应，他寻求改变美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以“美国优先”来组织和管理美国外交，用对抗性的办法来应对威胁，对美战后外交传统发起攻击，包括质疑多边贸易安排、同盟体系、价值观外交，声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自

[1] Stephen M. Walt, "Top 10 Signs of 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 Revisited," *Foreign Policy*, July 27, 2017.

[2] Francis Fukuyama, "The Populist Surge," *The American Interest*, February 9, 2018,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8/02/09/the-populist-surge/>.

由主义”国际秩序“根本不管用”，“不想要它”。由此，特朗普成为第一位否定战后美国所积极创立的国际制度体系的美国总统。他甚至认同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民粹政府，敌视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特朗普也强调西方的一致性，但从2017年7月在波兰、2018年9月在联大的两次演说可以看出，他把西方看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单元，以主权为边界，以历史传统和信仰为粘合剂，而非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共同体。

由此，“特朗普主义”轮廓初现，呈现出三层含义：一是对美自身而言，无友则无敌；二是对他国而言，有失才有得；三是对世界而言，大乱乃大治；总体上是“天下唯美国，其余皆尘埃”，具体说是“去奥巴马主义”。^[1]美国外交持续走向丛林冲突、保护主义及强人专制，将推动全球民族主义抬头，把国际事务由东西方共治的基调导向“文明的冲突”，并有可能使同盟关系首当其冲成为“美国优先”的牺牲品。事实上，盟友已经日益无法说服特朗普政府停止撼动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制度。美国陆续退出巴黎气变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威胁退出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等。小到国际邮件计费，大到国际战略稳定，美刻意贬低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折射出特朗普外交观念中的反建制诉求正在加速向国际层面传导。

（四）此轮民粹主义的生命力强劲

客观而言，民粹主义以平民价值为目标，代表底层大众的理想，强调平等，具有一定的正当性^[2]，因此，美国政要大多以“平民化”为招牌。两党为了争取民众支持，也会吸收民粹主义的主张，促进两党改革，推动政府政策改良，把时起时落的民粹主义思潮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和价值。

当前，两党选民基础重组，为了迎合选民，都在趋向极端，中间派或

[1] Jeffrey Goldberg, "A Senior White House Official Defines the Trump Doctrine: 'We're America, Bitch,'" The Atlantic, June 11,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8/06/a-senior-white-house-official-defines-the-trump-doctrine-were-america-bitch/562511/>.

[2] 蒋德海：《如何理解西方民粹主义》，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10期，第33页。

务实派力量减少。共和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信仰出现变异，民主党则面临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撕裂。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平台进一步扩大了民粹主义话语的受众范围，助力其崛起。例如，福克斯新闻、德拉吉报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等右翼媒体与美国主流媒体激烈碰撞，持续较量，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稳健的批判传统。自2016年以来持续壮大的左翼民粹力量——“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组织致力于实现“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1]，打破了社会主义的话语禁忌。民粹主义开启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远未完成。

也要看到，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狂热认知和政策最终很可能置特朗普于两难境地。目前尚不清楚的是，特朗普与政府体制的碰撞，是否会演变成极端力量的胜出和主导，还是说会加速体制对极端思想的吸纳和融合，从而减缓冲击？随着民粹主义把国内矛盾导向外部，例如，贸易保护主义就是美国对国内缺乏自信的表现，这能否稀释美国面临的内部改革压力？还是说特朗普外交终将在国际上碰壁、反弹于自身？有一点可以确定，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始终把所谓“改善全人类境遇”当作战略目标，“如果放弃这一重要的理想主义，美国就是背叛自己”。^[2]这可能将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和民粹主义反建制的边界所在。

二、当前民粹主义的根源

民粹主义是美国政治的悠久传统，它植根于社会中某种久拖未决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在传统价值理念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中，作为一种传统的政

[1] Benjamin Wallace - Wells, “How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Learned to Love Cynthia Nixon and Electoral Politics,” *The New Yorker*, August 2, 2018.

[2]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8月，第430页。

治文化元素而凸显，对现行路线发起冲击、形成约束，从而对精英政治形成张力。^[1]当前美国民粹主义的根源有：经济分配制度问题带来的不平等恶化、人口结构变迁造成的白人优势地位弱化、白人蓝领阶层和精英之间的民族主义路线和全球主义路线之争深化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对奥巴马执政的反弹。

（一）金融危机打开民粹主义的大门

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损失惨重，而且重创了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削弱了决策者和金融精英享有权力和财富的合法性。一方面是过度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走入死胡同，左翼力量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空前响亮；另一方面是华尔街受益于救市政策，甫一复活便故态萌生，大笔分红。相当一部分群体感到自己被跨越国界的世界经济所抛弃，被建制派政治家和银行家背叛，被大规模移民涌入带来的资源和就业压力所压榨。由此，本土主义和反精英情绪强烈，对全球化产生反弹。一批“全球化的失败者”、劳工阶层特别是白人蓝领成为民粹主义的生力军。其中，右翼民粹主义者还成为美国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力。

金融危机造成的心伤未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财富集中加剧。收入分配制度的扭曲导致中产阶级萎缩。中等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到2015年已经低于50%。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1971年占全国总收入的61%，这个比例在2014年已经下降到43%。从近几年看，1%收入最高者的收入占全部总收入的比例从2013年的20.27%增加到2016年的23.8%，同期90%收入最低者的收入占全部总收入的比例从52.73%下降到49.69%，^[2]贫富差距不减反增。二是权钱交易密切。70年代之前，有3%至4%的国会议员离职后成为进行院外活动的说客。现在42%的众议员、

[1] 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第36页。

[2]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December 9, 2015,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50% 的参议员离职后从事游说。据统计，奥巴马政府期间，有 100 多位政府官员来自同行业的游说组织，同样数量的政府人员在离职后流向利益相关的游说组织。^[1] 主流政治体制对穷人的诉求愈发冷漠，民众被排斥在公共政策话语权之外。

在此背景下，人们普遍质疑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担忧“未来一代人的日子会更糟”，“美国梦”变得黯淡。据统计，低教育程度的白人工人阶级成为最悲观的群体，这部分人中只有 44% 的人预期他们的子女会比他们自己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而黑人、拉丁裔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抱有同样期望的，都超过了半数。^[2] 鉴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资本垄断权力等趋势难以逆转，民粹主义根源仍在。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和困难，民粹之风恐将更强劲。

（二）人口结构变化加剧国民认同危机

美国历史上的两轮大规模移民潮均来自欧洲，且都具有不连续性，分别在 19 世纪中叶因南北战争和 20 世纪 20 年代因美国经济衰退及严苛的移民法而退去。彼时，较长的间隔期赋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时间融入当地。如今的移民潮却是以往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不仅移民来源地更加多元、分散，拉美裔、亚洲裔、穆斯林移民增速明显，而且移民入境后更倾向于聚居，与主流社会的通婚率减少，其同化比前两波移民慢。

伴随白人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低，白人人口即将失去作为主体族群的传统优势地位，这意味着美国持续获取移民的优势正在变成白人的劣势。据统计，到 2045 年，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49.7%，将成为美国的少数民族。考虑到年轻的移民群体对亚洲裔、拉美裔人口增长的巨大贡献，在 18 岁以

[1] Timothy Carney, "Eight Years later: Obama's broken promise on the revolving door," *The Examiner*, January 12, 2016.

[2] [美] J.D. 万斯著，刘晓同等译：《乡下人的悲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年 4 月。

下的“千禧一代”中，白人在2020年将成为少数。在18—29岁之间的有投票权的选民中，白人将在2027年失去人口多数地位。^[1]

与族群结构变化相应的是，以族群文化为依托的多种文化及宗教力量综合地影响着美国的文化认同，给新思维以更大的空间。全球化、多文化主义、世界主义等冲击了美国人的意识，各种势力向美国核心文化发起挑战，福音派基督教作为主导性宗教力量的地位受到冲击，白人优越感的传统动摇。这给美国人特别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的身份认同带来危机，担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历史上曾经荣耀的统治地位。共和党当下最大的力量优势就在于，它唤醒了白人对美国社会人口结构和主流文化的焦虑，牢牢吸引住了老年、蓝领、农村、低教育程度的白人。“茶党”、“另类右翼”等运动的兴起则是传统白人力量在思想、文化及政治层面的抗争和回归。

(三)“人民”和“精英”之间的裂痕加深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一书中所阐述的，白人精英把持的政府机构和出台的政策与非精英白人即民粹主义所称的“人民”利益之间存在落差。^[2]例如，以民主党为核心的政治精英专注于提升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忽略了中下层白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很多中下层白人认为自己是这种“逆向歧视”的受害者，“政治正确”运动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把特朗普看成“重振白人种族优越感和等级制的最后希望”，认为“使美国再次伟大”就是使美国再次变“白”。^[3]

对于美国参与世界经济，公众远不如精英人士热心。公众关心的是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内经济以及主权。精英人士首先关心的是支持国际

[1] William H. Frey, "The US will become 'minority white' in 2045, Census projects," March 14,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he-avenue/2018/03/14/the-us-will-become-minority-white-in-2045-census-projects/>.

[2]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7年3月版，第6页。

[3] Charles Blow, "The White Rebellio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2018.

贸易和人口流动,加强国际体制、促进美国人参与国外事务。在移民、贸易、就业等议题上,精英和民众之间存在重大意见差异。2015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民调指出,以共和党人为例,55%的共和党选民和16%的党内高层认为,移民和难民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61%的选民和20%的高层把控制并削减非法移民入境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有27%的选民、却有71%的高层愿意美国接收叙利亚难民;有62%的选民把全球化视为“好事”,而持此观点者在党内高层占98%;76%的选民希望政府把保护就业作为优先关切,只有37%的高层同意这么做。^[1]可见,公众高度重视边界和民族主义的价值,精英则把跨国身份和全球主义特性置于国民特性之上。

由于精英人士脱离民众,公众对政府感到强烈的失望,对政府信任度持续低迷。自2010年以来,一直只有不到20%的人认为国会称职的。^[2]选民十分担忧政府沦为权贵集团,并非他们的利益代表,通过掀起一系列抗议示威浪潮,反对资本垄断权力,控诉操纵政府的政治献金等,根本上是不满于精英政治将百姓利益排挤出财富分配的过程。特朗普所称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针对的就是“腐败、傲慢、自我膨胀”的政府、商界、媒体等精英。在他看来,这批人更加熟悉与外国精英打交道,疏远了本国群众,通过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而自肥。

(四) 社会“弱势群体”对奥巴马执政的反弹

奥巴马8年施政,他的种族背景和医改、移民两大政策取向催化了民粹主义情绪的迅速上升。奥巴马及民主党基于选举政治考虑,将政策重心倒向美国最下层的贫困民众和非法移民家庭。医改计划的实施使此前未有

[1] “United in Goals, Divided on Means: Opinions Leaders Chicago Council Survey Results 2014,” by Dina Smeltz with Joshua Busby, Gregory Holyk, Craig Kafura, Jonathan Monten, and Jordan Tama, June 2, 2015,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publication/united-goals-divided-means-opinion-leaders-chicago-council-survey-results-2014>.

[2] Congress Job Rating,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ongJob.htm>.

医保的数千万贫困民众受益，但成本主要由富裕阶层及中产阶级分担。富人及中产阶级上层虽有怨言，但对保费增加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强。中产阶级中、下层民众则对成本变化敏感、脆弱，认为其利益严重受损。奥巴马卸任前大力推动对至少 1,000 多万非法移民施行大赦，给予合法公民身份，虽未成功，但激起反对者的高度警醒和忧虑，认为此议一旦落实将进一步改变美国选民结构和政治生态，危及白人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奥巴马为改善 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群体的权利和生活状况，颁布上百项行政令和制度改革，忤逆了 WASP 的传统价值观，强化了社会“弱势群体”对于政权是为精英服务的判断。

特朗普从参选开始，就策划“经济的沮丧”、“建制的消亡”等话题，把蓝领阶层长期积累的对华盛顿政治圈的怨愤推向高潮。正如他所标榜的，“只有我理解你们的问题，只有我知道如何解决它们”，他主打民粹牌、排外牌、恐惧牌，成功把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蓝领白人转变为自己的“铁仓”。2016 年大选的出口民调显示，66% 的特朗普支持者和 22% 的希拉里支持者认为，这场选举是“阻止美国衰落的最后一次机会”。^[1] 特朗普甫一上台就高调反移民，在白人中间引起强烈共鸣。他的税改和就业法被解读为美国人民的胜利，工人工资上涨，私营企业得到更大动力。他还废除了奥巴马时期倾向多文化主义的大学招生政策，不再考虑种族因素，弱化了“肯定性行动”政策。在一定意义上，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是对奥巴马施政的反弹和回击。

三、美国民粹主义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潜在影响

前述可知，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反华。目前，反华意识形态主要来自美

[1] Betsy Cooper, Daniel Cox, Rachel Lienesch, Robert P. Jones, PhD, “Nearly One in Five Female Clinton Voters Say Husband or Partner Didn’t Vote | PRRI/The Atlantic Post-election Survey,” <http://www.prri.org/research/prri-atlantic-poll-post-election-white-working-class/>.

国权势集团内部,尚未与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合流。但是,新“中国威胁论”日益成为美国精英和班农、纳瓦罗等民粹人士的共同靶标,助推美国对华政策趋向强硬。

(一) 民粹主义与“反华”思潮

中美关系紧张化主要是受两国力量消长、彼此认知和国际政治趋势所影响,是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出了问题。民粹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传统文化力量。左右翼民粹主义长期对抗撕裂美国社会,给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造成困难。就成因看,民粹主义与反华舆论的同步高涨,都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冲击美国国内利益分配格局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蓝领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政府不愿或者无力改革收入分配政策,民众感到被移民挤压,被精英背叛。另一方面,特朗普抨击中国抢走美就业机会、“占美国的便宜”,部分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政策及华裔带来的资源竞争压力心怀怨恨,认为中国是美国问题的原因。可以设想,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恶化,或者移民数量保持现有水平,民粹主义势头仍将强劲,针对中国的一面会更强烈。中美关系作为一组外交关系,很可能与民粹主义引发的“文明的冲突”形成共振。

(二) 民粹主义与“反华”舆论有一致的思想逻辑

民粹主义与反华舆论均带有保护主义色彩。民粹主义奉行反智主义,相信直觉和道德判断,流行“阴谋论”,惯用排斥性话语来妖魔化和反对其他群体,引发民众的情感共鸣。右翼民粹主义还将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作为攻击对象,要求实施带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华裔移民以及华人留学生群体均遭到歧视。新“中国威胁论”则打身份政治牌,利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将美国自身问题归咎于中国。美国制定“全政府”对华政策,从贸易、投资、安全、人文等多领域入手,抵制中国影响力,迎合并激发了民众对中国的不满和不安。特朗普发表夸张言论的欲望,也

强化了社会层面对华的负面认知。

（三）民粹主义与“反华”都有被精英政治利用的一面

民粹主义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方式，具有看似“法不责众”的威力，特朗普政府从未寻求消解民粹主义情绪，而是在利用它，同时鼓吹新“中国威胁论”，推行自己的政治议程。一种情况是，精英煽动“阴谋论”，放大“中国威胁论”，在民粹主义平台上进行反华宣传，推销反华理念，例如2017年11月班农在东京发表关于中国事务的演讲，以及2018年9月接受以色列《国土报》的采访。另一种情况是，精英面对执政压力，用“中国威胁论”做辩护，把祸水引向中国，“反华”成为工具。例如，伴随“通俄门”调查深入和中选临近，特朗普及其副总统彭斯无端指责中国“干涉美中选”，有转移自身压力的一面。

（四）民粹主义尚未扛起“反华”大旗

前文论及，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根源是，在经济不平等加剧和人口结构变化不利于白人传统优势地位的背景下，中下层白人和精英之间的政治裂痕加深，白人蓝领阶层的沮丧感空前强烈。公众认为，精英把持的公共话语和政策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也反映在某些对华议题上。例如，虽然精英积极鼓吹新“中国威胁论”，但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实际在减少，好感度在上升。根据盖洛普、CNN等机构民调，认为中国对美是“极其严重的威胁”的人数，从2016年28%降至2017年22%。2015—2017年期间，“对中国好感度”民调显示，对中国“非常正面”的认知从8%增至10%，“基本正面”从36%增至40%，“基本负面”仅从34%增加了一个百分点，“非常负面”从16%降至13%。^[1]虽然美国民众视中国为外交挑战之一，但就应对方式而言，仍支持中美接触与合作，反对中美敌对。在亲特朗普的共和党人中，43%担忧中美贸易战伤及美经济；在不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中，

[1]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担忧者占 76% ;在民主党人中则高达 84%。^[1]

四、结 语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它奉行什么样的哲学，如何运用它的力量，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利害关系。^[2]民粹主义和新“中国威胁论”的同步升温对中国敲响警钟，预示着美国外交战略和对华政策两方面的深刻调整，对华示强成为特朗普政府整合内政外交所需要的“新常态”。由此可判断，美国政界总体将保持对华压力，展示强硬姿态，以迎合其保守派选民基础。从社会层面看，民粹主义势头较猛的中部地区受贸易战冲击大，其民粹情绪中针对中国的一面有可能上升。中国应对之策的当务之急是警惕和预防民粹主义与新“中国威胁论”两种思潮的合流。在中美竞争面凸显的背景下，倡导中美理性交往，做实做强中美经贸关系的共赢因素，使中美关系切实惠及两国社会和民众。也要看到，西方虽然在反华舆论上有联手共进的一面，但在民粹主义问题上矛盾尖锐。特朗普民粹主义并非只针对中国，他扶持欧洲右翼势力同欧洲传统精英的对抗涉及政权，美欧联盟出现艰难调整。中国仍可避其锋芒，借势而为，扩大与世界更多国家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领域的共识和利益，化解紧张因素，营造积极氛围。

【收稿日期：2018-11-15】

[1] Karl Friedhoff, Craig Kafura, "China Not Yet Seen as a Threat by the American Public,"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2018,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china-not-seen-as-threat-by-american-public_20181012.pdf.

[2] 资中筠：《20 世纪的美国》（修订版），商务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版，第 27 页。

ABSTRACTS

- 01 The New Trend of American Populism and Its Impacts**, by Shen Yame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of Department for American Studies, CIIS. Currently, populism is developing with a strong momentum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t from both right and left simultaneously exerting its influence and enter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politics, which has brought impacts on many Americ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y traditions. The endeavor initiated by populism to redistribute political power is not yet comple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ism has its own inherent roots to arise in the U.S., which include the intensified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demographic change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White supremacy, the deepening division between the Whites from the low and middle classes and the elites, and the backlash of the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 against the policies pursu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lthough it is not naturally taking an anti-China stance, populism echoes the rising of a new round of “China Threat” clamor, which has sounded the alarm for China. Populism has the same economic and cultural roots as well as thinking logic as the “anti-China” public opin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re both exploited by elite politics, we have to remain on alert and prevent them from coming together.
- 16 The US Mid-Term Election in 2018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acts**, by Dr. Zhang Wenzo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from the Division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 of the Institute for American Studies, CICIR. The US mid-term election is a “mid-term exam”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e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division in the U.S., the contest between